

# 哈 韦 尔 自 传



東 方 出 版 社

# 哈 韦 尔 自 传

捷 瓦茨拉夫·哈韦尔 著  
李义庚 周荔红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Vá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91  
根据纽约兰登出版公司1991年版译出

哈 韦 尔 自 传  
HAWELER ZIZHUAN

著者/[捷]瓦茨拉夫·哈韦尔

译者/李义庚 周荔红

封面设计/郭振华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6.375 字数/138,000

版次/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98-1/ D·69 定价3.05元

(内 部 发 行)

## 序

本书的成书过程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1985年，卡雷尔·赫维兹达拉向哈韦尔提出建议，要和他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并准备把谈话写成书。但是，当时卡雷尔住在西德，哈韦尔住在布拉格，彼此不能见面。不过哈韦尔还是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想在他即将50岁生日之际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于是从第二年开始他们便通过地下邮件的方式进行交流。据卡雷尔说，他们二人对于第一次尝试的结果都不满意，因为哈韦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像是在作论文。于是，卡雷尔便又写了50个左右的问题寄给哈韦尔；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哈韦尔把自己关在向别人借的住所里作了长达11个小时的录音回答。卡雷尔把录音记录下来并加以编辑之后，将手稿连同一些补充性问题（据卡雷尔说主要是“关于戏剧”的）寄给哈韦尔。哈韦尔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并于1986年6月上旬最后定稿。

本书于当年夏天在布拉格哈韦尔自己的地下出版物《艾迪斯·爱克思沛迪斯》丛刊上发表。秋天，英国的一家捷克逃亡出版机构鲁兹姆罗维出版社将这本书在西方出版。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民主革命仅一周之内，布拉格的梅兰特里赫出版社便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本得到合法出版的地下出版物。

翻译此书是我最乐意从事的工作之一。在我翻译了他的

《致奥尔佳》之后，哈韦尔曾说过那是一种“再创作”，这话一点不假。我使用了创作本书的方法进行翻译，先进行口译并把口译录下来，然后再进行编辑。这种方法也许不那么快，但我希望的是保持哈韦尔的谈话风格。

本书捷文版的书名是 Dálkový výslech，意思是“长途问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想使用它来作为英译本的书名，这虽然有些笨拙但却也准确，捷文本的讽刺意味也有所表现。可是出版者对这个书名提出了异议，于是便要另寻新名。

我的确觉得应该另寻新名，可就是一时找不着合适的。然后有一天博比·布里斯托尔从克诺普夫给我打来电话说：“你觉得去捣捣乱怎么样？”我以为她是说要去纽约东区转一圈再到 Dan Lynch 酒吧去，但她的意思是给这本书起这个名字。她的这种想法十分有趣：我曾把 výfržnictví 译成捣乱，我的朋友伊万·尹劳斯（还有其他一些人）就是被定为犯了这种罪而下狱的。尹劳斯后来写道，他喜欢我的这种翻译，因为它很准确地表述了他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那种假“和平”进行的捣乱。虽然哈韦尔也曾被指控犯了这种罪，但却始终没有因此被定罪；然而，他所从事的事业就一直是扰乱皇帝的平静心情。所以，虽然这个书名并非没有一点争议，但哈韦尔最终还是同意了使用这个名字作为英文版的书名。

也许有些有语言纯正癖的人反对这一译法，但我们不妨提醒自己，任何一本书，特别是一部译作都是集体创造的结果。我在此谨向那些帮助完成这本书的人表示感谢。感谢伊万·哈韦尔、戴沙·哈韦尔以及奥尔佳·哈夫罗娃给我的善意的帮助。感谢弗拉基米尔·汉泽尔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助我。感谢作者本人在革命期间耐心地解答我的询问。在此，

我还要特别感谢马西·劳菲尔所做的迅速而可靠的记录录音工作，感谢博比·布里斯托尔给我想出这个书名来，感谢爱德文·柯海恩以承担翻译费这样直接的方式表示他对哈韦尔的崇敬之情；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海伦娜与我共同承担在我翻译此书过程中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压力。然而，这本书却为产生这样一段历史起了促进作用。

保尔·威尔逊

## 引 言

1975年春的某一天，就在布拉格民族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厅的外面，一位朋友把一摞翻得很旧了的打印稿件交给我，并嘱咐我读完后再传给别人。在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碰头有一种密谋的味道：不仅自己阅读地下出版物而且还要传播，就凭这一点，我们俩就等于犯了罪。当然，我们被抓起来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这至少足以引起我们的谨慎。当天晚上，我坐在家里读起了这部稿件，心中带有一种只有干一桩违禁的事情才能引起的激动。

这是一封写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信，信中描述了华沙条约组织部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7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上下所处的一种凄凉的状态。作者描述的不是斯大林在他的帝国内所造成的那种令人打颤的恐惧，而是一种对生存的无名恐惧，这种恐惧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使人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再三考虑。秘密警察就像一张可怕的蜘蛛网一样在社会中无形地维系着这种恐惧感，不仅使人们的行为，而且使历史本身披上了虚假的外衣。

作者在信中说，当时政府正在剥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活力，使其成为一种死气沉沉的单调的统一。信中还做出了这种令人惊叹的预言：迟早，目前的政府将成为其自身的“致命的原则”的受害者，“生命不可能永远被摧残，在没有活力和虚假的活动这一表层之下，有一股暗流正在缓慢地、不知不

觉地要冲破这个表层。也许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这表层将会支持不住而被冲破。这个时刻将是在一种新的、独特的和看得见的事件发生的时刻……历史已不能再被理会了。”

信的日期是1975年4月8日，署名为“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

哈维尔于1986年完成了他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的谈话录。我1990年春天读起这本书时非常惊奇地发现，过去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件——从柏林到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哈维尔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员——赋予了这本书以多么丰富的意义。比如，哈维尔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60年代中期在面临共产党予以封闭的压力下，是如何为了一本小小的杂志——《特瓦什》的生存而进行斗争的。经过这场斗争，哈维尔发现了他所谓的“新的行为方式”：在与某个权力中心进行争论时，不要滑到模糊的谁是谁非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去，而要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而斗争，并做好斗争到底的准备。

1989年11月28日上午，哈维尔率领“公民论坛”代表团去同共产党政府进行谈判。这次所讨论的不是一份杂志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此前10天，布拉格的学生示威掀起了这场“非暴力革命”，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群众示威终于引起了11月27日星期一的总罢工。星期二的下午，政府便宣布从宪法中去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次谈判的详情，但总可以认为其内容不外乎是关于修改宪法的具体问题。“公民论坛”代表团在谈判中没有作出让步。哈维尔和他的伙伴们几十年前所学会的这一原则现在终于显示了威力。

不仅如此，哈维尔对“七七宪章”诞生的描述完全预示着在不同情况下“公民论坛”的创立。为了避免被视为非法，“七七宪章”运动的创立者把它称为“公民的创制权”，并避免提出任何公开的政治性建议。然而，从深层次上来说，那的确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是一个各种人物的联合体，他们中间既有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又有跟共产党从未有过任何关系的人（他们也许是共产党的受害者）；虽然他们背景各异，但对于运动的公开性、容忍性和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却都是同意的。哈维尔认为，“七七宪章”运动的多元性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将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具有一种真正的容忍性。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成就将永远不会从全民族的记忆中消失。他说：“这就是走向生活，走向对公共事物的真正思考，……其代价就是告别‘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论坛”正如哈维尔11月19日在布拉格希诺赫尔尼俱乐部所宣称的，它的创立是“七七宪章”运动的扩大。和“七七宪章”运动一样，这也是一个社会各方力量的联合体（到1989年，社会上已出现了许多组织），这些力量都是要寻求一种非暴力的、超越党派的解决当时危机的办法。“公民论坛”的纲领，即“我们所想要的”，在一周之后就公布了，起草人中除了“七七宪章”运动的签名者之外，还有其他团体的代表，这个纲领反映了这些公民团体在此前13年里的讨论。“公民论坛”之所以能够行动如此迅速，决定如此快捷，组织如此有效（尽管从表象看仍有些混乱）是与在过去这些年以来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建立起来的那样一张网分不开的。哈维尔对于“七七宪章”运动之前的那种气氛的描述就是11、

12月革命之前的那种极为混乱的而又令人兴奋的气氛的缩影。哈韦尔说：“我的住处就像29年大崩溃时的纽约股票交易所一样，或者说像革命的中心一样。”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1977年宪章派们受着“可怕的蜘蛛”的严密监视，而在1989年，这个蜘蛛已经消失，整个民族已开始完成解放自己的任务。

本书不仅使我们认识作为一个总统的哈韦尔，一个在为获得重生而勇敢地争取民主政权的斗争中的哈韦尔，而且让我们认识一个自视为平常人、有着平常人的需求、欲望、期待和性情的哈韦尔（他曾说他只是一个捷克的乡下佬，从不曾想过要移居国外，他喜欢待在捷克），一个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哈韦尔。于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政治家的作家哈韦尔真正地把自己写进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能力都来自于同一源泉，即他能够反映他周围人的希望和担忧。然而，他还是很现实地看待自己的作用。他写道：“我常常想大声疾呼：‘我已对担当创建者的角色感到厌倦，只想做一个作家应当做的事：说实话！’……或者‘冒你们自己的风险吧，我不是你们的救星！’但我总是欲言又止，想起帕托切卡对我所说的话：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看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给自己确定的角色，而在于看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去年秋天我又回到东欧。我曾在捷克斯洛伐克住了10年，在1977年当局反对“七七宪章”运动的浪潮中被驱逐出境，直到“革命”发展到第10天于11月27日才再次回到布拉格。我曾好几次跟哈韦尔联系，想给这本书增添一些新的材料，但他却都以这本书已经完成为理由表示了异议。他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由于他处于革命的中心，起着这么一个核心作用，给本书增加一些新材料就显得更为诱人，我

便燃起了说服他回答一些补充性问题的新希望。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过程中，实在很难找到他。他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但总是东奔西跑，行踪难觅。有一次我在巴鲁斯特拉德剧院见过他，还有一次我看见他被一群自愿保镖和支持者保护着离开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去开会。人人都说曾见到他。我的一位朋友在瓦茨拉夫广场时见到哈韦尔第一次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起出现在观礼台上。当示威结束时，她又看见哈韦尔和杜布切克在梅兰特里奇大楼里跳舞。

奥尔佳·哈夫洛娃和哈韦尔的弟弟伊万很愿相助，但他们只能提供一些可能找到他的地方。一天已经很晚了，我正呆在伊万和哈韦尔共住的公寓里时，哈韦尔回来了。我们打了招呼之后，他很有礼貌地建议找个日子和我一起在他喜欢的餐馆里吃晚饭，但是负责安排他日程的秘书却说，根本挤不出时间来。我们的见面都被无所不在的摄影记者们留在他们的摄影机里了。

12月7日，为安抚那些一直想见他的记者们，他在魔灯剧院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也赶去参加了。大部分时间他一直尽力避免回答他是否有意竞选总统的问题。当一位英国记者问到他在13年的“七七宪章”运动的工作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政治教训时，他回答说：“我得想一想，但现在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行事，说实话，即使在公民身份被贬低的情况下仍然像一个公民一样去行事，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总是有可能有所作为的。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就是投机取巧并以为这样的行为会有好结果。”

在我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我终于见到了哈韦尔。这时，他已经公开申明他将参加总统竞选，并让亚历山大·杜布切

克“做他的副手”，大街上到处都贴满了“哈韦尔当总统”的标语。那是在12月中旬一个天气阴沉的星期天，哈韦尔安排了4个小时和家人在一起，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奥尔佳去公园散步。伊万的起居室和哈韦尔的书房一样从窗子往外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堡的壮丽景色。我们进了伊万的起居室后便谈起这本书的事。他仍然坚持这本书已经写完的观点，而不愿意再加进什么新的内容。他说：“这本书有其自身的结构，如果我们要加进什么新的内容的话，那么，新版本就只像一个高高的圣诞节面包。”

接着奥尔佳喊他吃早饭，他邀我共进早餐。他一边喝汤一边讲述着对局势的总印象以及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革命是混乱，而我却喜欢秩序井然。我一直是讨厌革命的。我认为革命是自然灾害。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这类事情却无法计划、无法准备、无法预期，而我现在不仅是在这场革命之中，而且是在革命的中心。”

这时，电话铃响了，奥尔佳接完电话进来说，杜布切克要和他谈话。哈韦尔昂起头望着天花板说：“我还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们去公园散散步好吗？”

奥尔佳回答说：“好，可现在下雨了。”

哈韦尔说：“那么就撑把伞吧，过去三周内我一直呆在地地下室，我得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了。”

奥尔佳说：“我们没有雨伞。”

这位未来的总统便说：“那么我们就买一把吧。噢，等一等，今天是星期天，商店都不开门。”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噢，圣诞节快到了，有些商店是营业的。”

奥尔佳说：“为什么要买呢，真笨，我们去向伊万借一把不就行了吗。”

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哈韦尔从餐桌旁站起来，跟我告别并祝我一切顺利，然后便转身去找杜布切克谈话去了。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便是哈韦尔——哈韦尔总统——所希望的了。

保尔·威尔逊

1990年3月于多伦多

## 出版说明

本书是现任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的自传。是哈维尔根据捷克记者卡雷尔·赫维兹达拉的建议,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哈维尔于1986年曾通过地下邮件的方式,回答过卡雷尔提出的50个左右的问题,后又作了长达11个小时的录音回答。最后,哈维尔在卡雷尔整理编辑的原稿上增加了若干新的材料并于1986年最后定稿。本书于当年夏天在布拉格地下刊物上发表。

为了供党、政、军领导同志及有关人员了解研究捷克政局、捷“七七宪章”运动、“公民论坛”及其领导人的情况,我们组织翻译了这本《哈维尔自传》。

如公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1992年3月

## 目 录

|                   |         |
|-------------------|---------|
| 序 (保尔·威尔逊) .....  | ( 1 )   |
| 引言 (保尔·威尔逊) ..... | ( 1 )   |
| 第一章 成长 .....      | ( 1 )   |
| 第二章 戏剧创作 .....    | ( 31 )  |
| 第三章 仕途 .....      | ( 66 )  |
| 第四章 公开的敌人 .....   | ( 103 ) |
| 第五章 我的政治观 .....   | ( 147 ) |

127571

# 第一章 成 长

按照这里人的说法，你出身于一个挺有名气的资产阶级家庭。现在，在你即将迎来50岁生日的时候，请回忆一下你的童年，可以吗？

不错，我是出身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可以说是出身在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先让我回忆一下我的家史吧。我爷爷的爷爷是布拉格的一个大磨坊主，但是他有9个女儿，把全部财产都陪嫁用了，所以没给他唯一的儿子留下什么。我的曾祖父当了一名过磅员，这大概是个介于蓝领和白领之间的职位。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一下子从中产阶级跌入无产阶级的深渊。

我的祖父又靠着自己的勤奋重振家威。他学习了建筑学，借了一些钱，成功地铺了一座城市广场并一举成了一位承包商。此后，他又承建了各种建筑，其中包括位于布拉格的具有19世纪末风格的公寓楼。但是，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建造了布拉格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卢塞纳宫。他一个人承担了在今天需要几十个人去干的工作：绘制图纸，进行所有的必要的计算，在工地监工，负责资金出入，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工作。他属于第一代资本家或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代人完全是白手起家建立起个体商行，虽然开始时一无所有，但最终却腰缠万贯。我们家的资产阶级成分应归功于他，正是他才

使我们家第一次进入“资产阶级”行列。

我父亲继承父业，在布拉格南部买下了一片空旷的山坡，在那里建起了一处别墅群，取名巴朗多夫。他还在那里建立了一家阶梯状的饭店，并把这里的建筑和卢塞纳宫共同称为卢塞纳巴朗多夫饭店企业。我叔父从年轻时起就从事电影业，他在巴朗多夫建立了电影厂，并一举成为第一共和国时期和捷克成为纳粹保护国时期最大的“电影大王”。

我很难判断我母亲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资产阶级。我的外公雨果·瓦弗热切卡出身在西里西亚的一个穷苦家庭，但他是个多面手：他当过《人民报》金融编辑，担任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许多国家的大使（他还做过几天政府部长），也做过巴塔的一个工厂的经理，同时他还是个业余作家。他写过《茉莉什卡》，后来被拍成电影并由著名演员布里安担任主演。如果你对我们家史的详细情况感兴趣的话，那么你还可以去读读我父亲写的总共分6部分的回忆录，那是一本私人出版物。在60年代末，我们兄弟俩和我妻子一起说服了我父亲去写回忆录。我们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让写作成为一种“治疗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父亲要继续精神健康地生活就必须有事可做，所以在他即将80岁的时候，我们说服他开始写回忆录。结果，他写出了一本出色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书来（爱娃·坎图尔科娃曾就此书写过一篇很好的评论文章）。从字里行间你能感觉到促使我父亲奋斗的（对于我祖父也同样）并不是那种臭名昭著的资本家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而是一种创业精神，一种纯洁而朴素的创造热情（我父亲因巴朗多夫建筑而负了债，既然不需付战后有名的“百万富翁税”，所以他也不可能是个百万富翁）。他在私营企业时期，除了继续办他的私人企业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而后